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有所思

“中华民族”观念在抗日战争中喷薄而出

□ 周励恒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悲壮的反对外来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战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中华民族不仅获得了新生，而且从此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路。在抗日战争中，各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真正结成了一个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民族观念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中华民族”既是多元的，包含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而对他国而言，它又是一体的。

“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

“中华民族”一词是在清末民族危机深重、有识之士探索救亡图存之路的背景下产生的，据考证，首先使用者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此“中华民族”指的是华夏族，虽然如此，但梁氏在此后的文章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并解释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可见，这个词自一开始使用，即有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之意存在。

应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称谓，首先是以民族实体的存在为基础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如回族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统一，而达到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生活在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众多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实体。其次，“中华民族”作为一种称谓逐渐被各族人民所认同，是与中国的民族危机、边疆危机分不开的，是与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紧密相连的，它本身就含有民族团结、民族情愫、历史文化认同等意蕴。与“中华民族”同时出现的还有“华族”“华夏族”“中国民族”“国族”等称谓，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些称谓相互混用，甚至相互代替。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得到广泛认同，其他称谓见诸书刊则逐渐稀少。究其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在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对外方面，展现了更加鲜明、更加强大的感召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都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危难的形势，促进了中华之民族意识的觉醒。傅斯年写有文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他说：“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伦理，俨然一个家庭。世界上的民族，我们最大，世界上的历史，我们最长。这不是偶然，是当然。‘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句话，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傅氏以一个史学家的见识，论述中华民族必将通过抗战而复兴，指出：“中华民族自有其潜藏的大力量，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草昧之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这不是自己安慰的话，有事实为证。”抗战兴起后，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也是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顾颉刚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少数民族学者如著名维族史学家翦伯赞、苗族学者鲁格夫尔等也参加了讨论。尽管这次争鸣反映了学术界在民族观方面存在分歧，但参加讨论者都认为坚强的民族意识对反抗外来侵略压迫极其重要，赞同发挥“一个”的意义。193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大型辞书《辞海》中有“中华民国”条目，其中对“中华民族”作了这样的解释：“合汉、满、蒙、回、藏、苗等人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人口共约四万万七千余万。”这表明，“中华民族”概念经过多年的使用，至此内涵已趋于明确。

“中华民族”是抗日战争的动员令与凝合剂

“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抗日战争时期切实得到少数民族的赞同。1938年7月广为传布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此时，“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更是受到报纸、广播电台以及抗日歌曲的推动，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广为传唱，激励各族民众奔赴抗日战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引起各族人民的共鸣；“中华民族”的符号认同，深入人心。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深刻论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率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和信念。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出代价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我们要告诉那些发疯的敌人，你们的目的一定达不到。”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重要著作中，毛泽东专门设立一节论述“中华民族”，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上的中流砥柱作用。

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战。在战争中，产生了大批少数民族抗日将领和英雄。著名的有白族的周保中，满族的赵尚志、佟麟阁，侗族的粟裕，壮族的韦国清，土家族的廖汉生，瑶族的江华，回族的白崇禧、马本斋，彝族的张冲，苗族的石邦藩，藏族的扎西，蒙古族的萨斯俊等。这些民族精英，为捍卫国家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谱写了壮丽的篇章。国、共两党建立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统一战线，这个“民族”不是单指某一个民族。国民党发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国家民族之利益应高于一切”的主张，得到共产党的积极响应。承认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是国共两党共同维系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当民族统一战线遭到破坏、抗战大局受到冲击时，国内广大同胞以及海外华侨痛骂破坏者是民族罪人。民族意识，使得任何损坏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都会遭到谴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高度自觉的民族意识是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之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得以执行，直至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深层原因。

早在抗战前期，回族知识分子马天铎发表文章说：“卢沟桥的炮火已经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条心融冶成一座坚实的牢固不破的整体。”是的，抗日战争重新锻铸了中华民族；历史已经证明，将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牢固地确立于中国各族民众和海外华侨心中的，正是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

道教贵生思想通过丝绸之路的传播

□ 王皓月

始于公元前2世纪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文明沟通的重要纽带，其意义不仅局限于物资、人员的往来，更促进了包括宗教在内的文化传播。形成于外国的佛教、景教、犹太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众多宗教都借助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而中国本土产生的道教也曾经由丝绸之路向西域传播。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以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为契机，让其认可了道教的贵生思想，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为后世留下了“一言止杀”的佳话。

关于丘处机接受成吉思汗召见的过程和二人的对话，《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道教方面的文献多有记载，虽然其中可能存在虚构的情节，但是整体而言是可信的。因为，成吉思汗主动召见丘处机一事是不争的历史事实。那么，丘处机身上有何吸引成吉思汗之处呢？那就是，成吉思汗对不死药有强烈的渴望。耶律楚材《西游录》和释行迈撰《至元辨伪录》记载说，当时有一个名叫刘仲禄的人，因常献养生药物而受到成吉思汗的信任，他进言称丘处机已经三百岁，有保养长生之秘术。1219年，时年56岁的成吉思汗被刘仲禄所说动，决定召见丘处机，欲得其长生之药。

当然，除了求长生之药这个直接动机之外，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还有更深的意图。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随着其铁骑的前进不断扩张，征服了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民族。所以，蒙古帝国内部宗教的多样化成为趋势。加之，蒙古人的信仰属于萨满文化体系，是一种自然崇拜和泛神论，并不具有排他性，所以，成吉思汗对源自中原的全真道自然全无排斥之意。甚至可以推测，在战乱不断、社会陷入混乱、人民痛苦绝望的背景下，成吉思汗也试图借助全真道的影响力来维护统治，笼络人心。

我们可以从一件事看出全真道和丘处机在当时的号召力。1214年，山东杨安儿等起义，登州和宁海不平，金朝驸马都尉仆散安贞请丘处机进行抚谕。丘处机招安两州获得成功，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不仅是金，南宋和蒙古也争相向其示好，希望丘处机能够为自己所用。因此可以说，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长生药。

那么，成吉思汗的召见对于全真道和丘处机方面又有怎样的意义呢？丘处机是全真道开祖王重阳的七名高徒之一，王重阳之后，以这七人为中心开展传教活动，让全真教获得很大的发展。1187年，王处一被金世宗召唤，询问养生治世之术，翌年，丘处机也被召唤并受到了厚待，全真道与金王朝的关系变得密切。但是，随着蒙古势力的崛起，金和南宋显然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如果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很有可能让整个全真道的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在对时局进行判断之后，丘处机决定答应成吉思汗的邀请。

丘处机当时已经73岁高龄，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沿丝绸之路远赴中亚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与成吉思汗的钦差刘仲禄见面之初，丘处机有所顾虑，没有欣然同意。他甚至曾对道徒说：“其道合与不合，未可必也。”可见，对于全真道的理念是否能得到成吉思汗的认可，他还是带有一定的怀疑。但是，劝说成吉思汗减少杀戮的使命感令丘处机下定决心，正如他在临行前的诗中所言：“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其大义凛然正体现了丘处机胸怀天下苍生的使命感。

1220年，丘处机带领18名弟子从山东莱州昊天观出发，一边沿途传播全真道思想，一边追赶蒙古大军西征的脚步，两年后西行至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才得以与成吉思汗相会。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之后，开口便问：“远来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丘处机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丘处机诚实的为人和坦荡的态度让成吉思汗颇为欣赏，为日后的交往奠定了信任的基础。

某日，成吉思汗在狩猎时落马，险些被附近的野猪伤害，丘处机乘机进言，说天道好生，堕马是天戒，野猪不敢上前是天之护。成吉思汗对于天意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接受了他的建议，此后两月不出猎。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性情有深刻的洞察，所以才能巧妙地向其宣传全真道贵生的思想。

《元史·释老传》记载说，成吉思汗向丘处机询问治国之方时，被告之以敬天爱民为本，询问长生之道时，被告之要清心寡欲。对于这样的观点，成吉思汗表示十分认同。每有战事，丘处机必然关心能否不杀人。成吉思汗询问不杀生的原因，丘处机就解释说：“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恩推德，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宏基可保。”

丘处机以有利于个人养生和政权长远统治的角度宣扬不杀生的重要性，这正是能够让成吉思汗转变思想的关键所在。最终，成吉思汗在临死前宣布：“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知朕意。”成吉思汗发现，游牧民族掠夺式的征服方式，已经不适用于稳定的长期统治，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所以，安抚百姓，获得民意的支持更为重要，“止杀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的，而这与丘处机的反复劝说无疑有密切的关系。

作为回报的是，成吉思汗厚待全真道士，免除其徭役和赋税，更让丘处机掌管天下道门事务，让原本独立发展的全真道逐渐融入道教，成为与正一道并列的道教两大派。1224年，丘处机东归，居燕京长春宫，以此为中心大力发展全真道，派弟子去各地营造宫观，成为大量流民的庇护所，全真道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

追求个人长生与成仙是道教早期的目标，刘宋以后，《灵宝经》从佛教吸收了大乘思想，开始强调对他人的救济优先于个人的修炼。我们回顾全真道发展的历史也可以发现，开祖王重阳原本不过是普通的内丹道士，他开创的全真道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庞大的教团，根本原因在于其教法重视“功行两全”，特别凸出“行”的重要性，摆脱了神秘主义和个人修行团体的局限，真正成为了一个具有社会功能的大众宗教。金、元时代战乱不断，正是因为全真教徒实践利他行为，所以获得百姓的拥护，由此获得了朝廷的重视，逐渐与国家权力结合，被赋予一定的便利和特权，进而加速了教团的扩张，实现了宗教发展中的良性循环。

贵己之生，必先贵他人之生；贵人之生，必先贵万物之生。道教这种齐同慈爱、天人合一的贵生思想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今天中国复兴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国家软实力，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华春秋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家和业兴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

杨亿的才气与率真

□ 陈良

北宋是一个文化极为繁荣的朝代，涌现出众多文人雅士，犹如璀璨群星闪烁在历史的天空。杨亿（974—1021年），无疑是那群星中的一颗，值得后人敬慕。

杨亿早年以神童闻名，七岁能诗文，与客人谈论，显得很老成。十一岁那年，宋太宗闻知其名，诏令地方官送他进京应试词艺。接连三日，试诗赋五篇，杨亿皆援笔立成。太宗甚为叹赏，当即命内侍送他到中书省面试，他即兴赋诗一章，宰相惊其俊异，削章为贺。太宗爱才心切，翌日任命他秘书省正字。不久，他返乡服丧，在家治学，昼夜不息。淳化三年（992年），杨亿参加科举考试，被赐进士及第；此后历任著作佐郎、知制诰。真宗时，他担任过左司谏、知制诰、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等官职。

在人才辈出的北宋，杨亿堪称大家。他天资颖悟，终生不离翰墨，文风雄健，才思敏捷，援笔成文。且构想精密，规裁得当，洋洋数千言，不加点窜，一气呵成；当时学者为之叹服，公认他为一代宗师。他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此外，他乐于诲诱后进，别人有片辞可纪，无不为之传诵，不少人经他提携而成名。

不过，杨亿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景德二年（1005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聚集于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册府元龟》）；编书之余，他们作诗酬唱，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数十年。西昆体虽然未能在唐诗之外开辟新的境界，但是相对平直浅陋的五代诗风而言，它整饰、典丽、深密的诗风毕竟意味着艺术上的进步。

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随着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创新的诗风兴起，西昆体的影响悄然衰微，以致丧失诗坛主导地位。但是，其代表人物杨亿身上表现出独立自尊、率性纯真的精神气质，无疑在北宋士林中树立了正面典范，对宋代士人品格的塑造产生过积极影响。

入仕以后，杨亿主要在馆阁从事文字工作，尤其是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属于正宗御用文人。身为御用文人，杨亿却毫无奴颜媚骨，并不因为吃官家饭，就一味为官家歌功颂德。至道元年（995年），太宗亲制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大都争相称颂拍马屁，唯独杨亿表示忧虑，担心皇上因爱好影响政事。杨亿性格耿直，敢于直谏，真宗搞劳民伤财的祥瑞封禅，他竭力反对。他崇尚名节，绝不依附皇权而谋求个人富贵。有一次，杨亿起草答辽人国书，其中有“邻壤交欢”语句。真宗在旁边批注，写上“朽壤”“鼠壤”“粪壤”等字；杨亿心里很不爽，随即改为“邻境”。第二天，杨亿请求罢官。真宗再三慰谕，他才答应留任。事后，真宗对宰臣说：“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议册刘氏为皇后时，真宗想让杨亿起草诏书，派丁谓谕旨，杨亿认为刘氏有过婚史不宜母仪天下，故而婉言谢绝。丁谓劝他：“你就勉强起草了，何愁不富贵。”杨亿回答：“如此富贵，并非我所愿。”没办法，真宗只好另请他人起草册封皇后的诏书。

杨亿虽频忤圣意，真宗并不计较，对其礼遇依旧。真宗后期，为一群小人包围，王钦若、丁谓先后拜相。王钦若曾与杨亿在馆阁共事，同修《册府元龟》与国史，“其序次体制，皆（杨）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杨）亿审定方用之”。王钦若是“奸邪伪险”的小人，为当时“五鬼”之首。尽管王钦若骤贵位高权重，但杨亿鄙薄其为人，根本瞧不起他，引起他嫉恨；还有陈彭年，也是以文史而上进，妒忌杨亿名望超过自己，于是与王钦若沆瀣一气，暗中诋毁杨亿，甚至在真宗面前散布杨亿说皇上不会诗文的谣言。真宗颇有重文的雅趣，时常写些诗文赐予大臣，既能与大臣沟通思想，又能展现文采。一日，杨亿正在值班，忽然被召至禁中。真宗招呼他坐下，随即拿出数篋文稿展示与他看：“卿认识朕手迹吧？这些都是朕亲自起草的，未尝命令臣下代笔。”杨亿一时不知所对，惶然顿首拜谢，快快退出。当他意识到有人在背后造谣中伤自己，不禁萌生去意。因为他坚持真实的自我，不屑于向君王邀宠，更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

正好，杨亿有别墅在阳翟，母亲前往探视，在那里病倒了。于是杨亿给孔目吏留下请假条子，就连夜奔去看护母亲。隔日，真宗听说杨亿母亲生病，派遣使者以汤药金币慰问。使者进入杨亿家门，才知道他已经离去。一时间，朝论哗然，认为杨亿率性而为，有失体统。真宗颇为恼火，与宰相王旦说：“杨亿身为侍从官，怎能如此自便！”王旦一边为杨亿开脱，一边建议给予处分。不过，真宗终究爱惜杨亿的才能，迟迟不肯下达处分他的诏命。逾月之后，杨亿以生病为由请求解职，体面而退。不久，真宗任命他为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并特许他在京城居所疗养，康复后赴任。

就这样，杨亿身处最高权力中枢，却不为权势所扭曲，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不失真性情，不失真气质，实在难能可贵。杨亿无疑富有才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那些体现其才华的诗文不再充满魅力，而他的气质风骨总会让人肃然起敬。作为士大夫，杨亿在仕途未能春风得意，但他活出了文士的本色与风采。当然，杨亿活得有气质或个性，离不开宽松的政治环境。宋代皇帝大都有文化有涵养，对待士大夫比较宽容优厚，太祖立下“不杀士大夫”的遗训能够遵守。唯其如此，杨亿才能得到君主的体谅与宽容，才能活出自我的风采。

人物志